

## 第二章 中共政黨屬性的內涵

本文第一章已將西方政治學對於政黨屬性的定義，進行回顧論述。本章則由上述定義出發，以屬性的政治分群標準 (Political Cleavages)，針對「中國共產黨應該屬於什麼樣的黨」這個首要中心議題，再行檢證。

### 第一節 西方政黨概念下的中國共產黨

本節將從傳統政黨理論、政黨系統、國家政體與能力圖象三個角度，界定西方概念下的中國共產黨。

#### 一、傳統政黨理論：

政黨，在政治學領域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在中國古代，「黨」是地方單位的名稱，與「黨」字較有關聯者則是「朋」，「朋黨」這一複合名詞其義為「追隨一位領袖，在政治上相互協助，黨同伐異的一群人。」<sup>1</sup>中國歷史上，朋黨制度較為發達者，首推明朝，而一直要到二十世紀，真正的、惟並不具備完全功能的政黨（如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才逐漸出現。

至於政黨概念與理論的成熟，主要來自於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定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政黨，可能必需具備某些條件或機能，依據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 的觀點，一、政黨並非派系 (Factions，筆者註，意近中國的朋黨)；二、政黨是全體中的一部份 (Part-of-a-Whole)；三、政黨是表達的管道 (Channels of Expression)。<sup>2</sup>更精確地說，政黨主要的功能是作為表達的機制 (Expressive Instruments) 和溝通的手段 (Means of Communication)<sup>3</sup>。

<sup>1</sup>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2 年 5 月），頁 204。轉引自葛永光，*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頁 21。

<sup>2</sup>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5.

<sup>3</sup> Ibid. p.28.

薛特史耐德 (E.E.Schattschneider) 指出，只有真正能夠解釋多數統治意向事實的組織，才能稱為政黨。<sup>4</sup>

紐曼 (Sigmund Neumann) 認為，政黨應該是將雜亂無章的群眾意志予以組織(Organize)的機制團體。<sup>5</sup>

錢伯斯 (William N. Chambers) 從結構面的角度觀察稱：政黨是一種具有相當持久性的社會集合體，目標是追求政府職位與權力，將政府中的領袖與政治追隨者之間的組織架構予以聯繫，藉以產生相同的觀念與效忠認同的符號。<sup>6</sup>

蘭尼(Austin Ranney)做出了歸納性的總結指出，政黨應該包含以下五點特徵：

1. 政黨是一群人的集合，共用一個名稱。
2. 有組織的一群人有計畫地共同行動以完成組黨目標。
3. 整個社會承認政黨具有組織與推廣其主張的合法權力。
4. 政黨推廣其主張的某些活動，成為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的主要機制。
5. 政黨的主要活動在推選公職候選人。<sup>7</sup>

基本上，西方政治學界有關政黨的傳統理論，大體從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的角度，去解釋作為一個政黨應該具備的要件。誠如上述定義與第一章所介紹之政黨屬性，包括利益集結與表達 (Interest Aggregation & Articulation)、政治溝通 (Political Communication)、政治動員 (Political Mobilization) 等，都應該是政黨的基本動能所在，而其最終目的，則是透過民主機制的選舉過程，推舉候選人進而贏得選舉，組織具有合法性的政權。

以蘭尼的歸納為例，中共應可符合第一至三項以及第五項的若干政黨特徵。此外，他又以現代民主國家為對象，用理念 (Belief，主要指黨的政綱)、集權程

<sup>4</sup> E.E. Schattschneider, *The Struggle for Party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48), p.10.

<sup>5</sup> Sigmund Neumann, e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397.

<sup>6</sup> William N. Chambers and Walter D. Burnham, ed.,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5.

<sup>7</sup> Austin Ranney, *Governing: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林劍秋譯，*政治學：政治科學導論*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2版2刷)，頁257。

度 (Centralization, 指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黨紀 (Party's Discipline, 指黨領袖為使成員服從和嚴守紀律的手段)、團結性 (Party's Cohesion, 指擔任公職的黨員奉行其政黨對於主要政策議題指示的支持程度) 等四項指標, 將政黨進行細部分類。<sup>8</sup> 依其設定前提, 筆者以為中共在政黨理念上應屬於使命型政黨 (Missionary Party, 相較於掮客型政黨 Broker Party 而言); 在集權程度上採取中央掌握絕對權力的手段, 地方配合的時候居多; 在黨紀行使上, 從中央到地方層級均設有「紀律檢查委員會」一類的組織, 以貫徹黨命令的執行; 最後在黨員團結性上, 中共歷來堅持的以黨領政模式, 將政府視為黨的行政部門, 黨透過將黨員安置在政府關鍵崗位上, 使得從政黨員必須秉黨中央的意志而行,<sup>9</sup> 寡頭鐵律的理論在中共內部表現的特別顯著。從最低階層的村委會到最高權力頂峰的國家領導人, 中共自有一套內部提名或推舉的遊戲規則, 在行政議程之前先行完成人選部署工作, 這種程序因為在職位的產生人選方式上, 缺乏選舉競爭的機制而屢遭西方詬病, 這實際牽涉到國家政體與政黨系統的設計問題, 容後進行分析。

此外, 作為一個政黨, 中共還具備了其他西方論述中的大部分功能, 包括了基本黨組織 (例如小組、省市或地區黨支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共同的意識形態與目標 (例如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甄拔政治人才與菁英 (例如鄧小平所提的幹部「四化」、「十六大」前所提出的「黨政幹部選拔工作任用條例」、政治動員 (例如相應於行政層級的各種黨員代表會議) 與宣傳能力 (例如各層級均設有宣傳組織、擁有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 等。

質言之, 西方政治學界幾乎都承認: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 經過二十八年的革命, 從一九四九年執掌中國政權至今, 是一個存在的現實。惟大多數學者在對政黨進行定義時, 往往以民主經驗的出發點, 作為主流政黨的界定, 例如杜瓦傑即認為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 就是存在一個 (或數個) 有組織的、甚至忠誠的反對政黨; 東方式民主, 尤其是共產主義政體則沒有這種制度設

---

<sup>8</sup> 同前註, 頁 266-273。

<sup>9</sup> Alvin Rabushka, *The New China*, 鄭功、季谷譯, 新中國 (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民國 81 年 5 月), 頁 33。

計，故欠缺了西方國家反對黨的功能，即「以權力限制權力」。<sup>10</sup>甚至有學者以為，中國政體無須民主的原因在於：因為民主的核心規則是多數決（Majority Rule），政客必須靠選票與黨派利益緊密結合，這意味掌權黨派或許會透過討好強大利益集團的最低要求，維護其政治利益，在此情形下，民主機制就會挑動利益集團爭奪政權，帶來政治不穩定，這是一向強調形式上團結、穩定、大局的中共所無法接受的。<sup>11</sup>依此角度看待中國共產黨，無庸置疑地，中共所具備的政黨特性必然與西方所標示的「標準」政黨代表類型產生相當大的出入，但這並無損於中共符合政治學分類中「政黨」領域一員的事實。

## 二、政黨系統：

政黨系統，指一國或一政治體系中的政黨，其彼此之間的關係所構成的模式。西方學者通常用這個途徑，界定各國內部政黨政治的發展程度與單一政黨的性質。一般而言，政黨系統的研究標的，包括了政黨的數目、目標、力量與結構、支持來源等面向。<sup>12</sup>

就政黨數目而言，西方學界對此的分類林林總總，概括是以一黨制（其中還包括極權獨裁、獨大支配、或變體的一黨制）、兩黨制（以西方民主國家為最）、多黨制（以北歐國家較為盛行）、無黨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與蘇丹王國）為主要標準。<sup>13</sup>中國大陸現行政黨體系，是以中共為主幹，輔以其他八個民主黨派共同組成，但不能因此將其納入廣義的多黨制範圍。因為中共定義與允許的政黨系統，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體制，毛澤東在 1957 年

<sup>10</sup> Maurice 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雷競璇譯, **政黨概論** (香港: 青文出版社, 1991 年), 頁 360。

<sup>11</sup> Larry Diamond, "The Rule of Law 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2, Number 35 (May 2003), pp.319-331.

<sup>12</sup> Herbert M. Levine 徐以政黨的數目、目標、力量、結構、支持來源等五項指標，觀察政黨體系的運作與分類。惟筆者認為，Levine 的分類說明，有關政黨力量與結構的面向，似可結合討論，因此本文採取結合方式，仿 Levine 計提出四個標準。見 Herbert M. Levine, **Political Issues Debated: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王業立等譯, **最新政治學爭辯的議題** (台北: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 1 月), 頁 265-270。

<sup>13</sup> 關於各種政黨制的研究，請參閱 Austin Ranney and Willmoore Kendall,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XLVIII, 1954, pp.477-485. Robert A. Scalapino and Junnosuke Masumi,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Gwendolen M. Carter, ed., *African One-Party State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the Party in Single-Party African States," in Joseph 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201-216.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指令，「十二大」又將此擴大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從實際政治資源分配情形來看，中共作為一個唯一的執政黨，其他「黨派」僅具備參政、協商、甚至弱勢監督角色，無論組織、成員、經費絕大多數來自中共的挹注，根本無法自行構成一個完整的政黨形式；特別是「四個堅持」納入國家憲法後，在無特殊情況下，中共長期難以撼動的執政黨地位更具法律效果。因此，迄今中共被認為是介於一黨極權獨裁與一黨獨大支配之間的定義地位，得到西方學界較多的共識。

從政黨目標言，中共從早期的一個革命型政黨到建政後的行政黨，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右鬥爭、文革、改革開放等時期，其藉由意識形態核心領域所制訂出的各項方針路線，觀照至實踐層面，就是為了達成由社會主義（精確地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終極目標，為了實現此目標，中共立足執政地位的政治現實就絕不能改變。例如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即認為，中共的政治系統之所以會出現變遷，導因於最高領導人對於外界挑戰的特殊回應，但是無論如何，保有政治影響與決策權，才是深層的考量。<sup>14</sup>這種理念、使命與權力交織的政黨性質，造就出中共以歷史論述主軸搭配政策選項變化的獨特風格，當然，領導人的個人意志，佔了很重要的決定成分。

從政黨力量與結構言，西方學界主要觀察的焦點在於經由選舉所獲得的選票與國會席次，以及領導政黨的少數菁英與黨員群眾。由於中國大陸並非採取全國性的差額民主選舉以決定執政權誰屬，而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機制的表象——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產生，尤其是中央層級，在黨委組織的大力干預下，真正的差額選舉實現可能性仍不大。<sup>15</sup>因此，中共目前在行政與立法範圍掌有全盤且無可挑戰性的主導權，根本無須探究其在選票或席次上的數額，就可明言中共一黨制度的絕對性。

---

<sup>14</sup>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21-35.

<sup>15</sup>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89年3月），頁68。

其次，身為全世界最大的政黨，<sup>16</sup>加上中共長期以來階級政黨的定位，理應是一個以人民群眾與黨員意向為主的政黨；不過，因為權力格局的首要性，牽動了中共無論在提名制度、政策規劃、政治酬庸以及意見表達上，偏向幹部黨的事實。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指出，在中共內部想要躋身更高層次，黨組織的評價要比在體制中的表現更為重要，目前中共所有的政治系統，都已經高度的個人化，崇尚菁英決定的結果，使得中共內部呈現複雜的組織網絡。<sup>17</sup>此外，中共仿效蘇共的任命體制（Nomenklatura）來決定黨、政府和其他機構（例如司法體系、教育界、企業、醫療體系、研究單位、宗教界等）的領導成員，更突顯出中共以少數決定多數的菁英黨特性。<sup>18</sup>

從政黨的支持來源觀察，主要重點置於黨員的組成、社經背景與財務結構。中共目前擁有的六千六百餘萬黨員（人數結構見表 2-1），分屬社會各階級與階層，惟從表 2-1 看，無產者與低收入戶幾佔一半，與大陸八億農民人數相比，則近三千萬的無產階級黨員顯得微乎其微，中共所謂的無產階級代表地位，本屬牽強，只能經過政治動員與宣傳包裝，使其化身群眾黨的表象。事實上，幹部群佔了黨員結構的三分之一，更能突顯加入中國共產黨有助於提升個人政治位階的現實，因為能夠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的意義，遠高於一般民主國家民眾參與政黨的初衷，再加上趨近幹部黨的菁英統治模式，構成了中共黨員在權力追求的驅使下，支持黨的基礎力量。

---

<sup>16</sup> 據中國美亞網，<http://www.cnmaya.com> 資料顯示，至 2002 年底止，中共黨員人數已超過 6450 萬人，居世界第一位；黨員人數佔全國人口比例 5.2%，亦名列前茅。另據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n> 報導，至 2002 年 6 月，中共黨員總數為 6635.5 萬名，較美亞網之數據為多。官方網站新華網，亦於同時發佈相同消息，顯示後兩者數據較為可信。較為正確的資訊，應屬人民網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公布數字：至 2002 年底止，中共黨員人數為 6694.1 萬人，<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027/1944059.html>。

<sup>17</sup>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th Refor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5), pp.183-184.

<sup>18</sup> *ibid.*, p.209。

表 2-1 中共黨員人數與結構

階級與職業屬性	人數（萬人）	比例
工人、鄉鎮企業勞動者、農牧漁民	2991.3	45.1%
機關幹部、企事業管理單位人員、軍人、武警	1411.2	21.3%
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	770.1	11.6%
其他	1462.9	22%

資料來源：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2002年9月1日。

另一個易於忽略卻又啟人疑竇的議題，在於中共內部經費的來源與使用，但長久以來，這是難以一窺堂奧的研究禁地，相關成果屈指可數。筆者蒐得一篇有關中共黨費的研究文章，內容大致為：

「黨費究竟能為中共帶來多少收入呢？現在凡有收入的黨員，工資少則二三百元，多則上千元，我們如以平均五百元計，每人應交五元黨費，<sup>19</sup>五千八百萬黨員每月交黨費達兩億九千萬元人民幣，每年則約有三十五億元。這個數位應該是估計過高的，因為五千八百萬黨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無工資收入的，包括一些農民、青年學生、家庭婦女、殘障人士等，而這一部分的數位應該不會太少。那麼，仍以每年三十五億元的黨費收入來看，表面上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對這個超級政黨來說，實在是入不敷出。中共堅持一元化的領導，幾乎所有的黨組織主要領導人，如黨委書記、黨組書記、支部書記等，都是不兼行政職務的專職黨務人員，另外，有相當一部分非主要領導人，包括黨委委員、黨組成員、也是專職

<sup>19</sup> 香港明報報導，據中共規定黨費的徵收原則是，月薪在四百元人民幣或以下者，交納月薪的百分之零點五。四百元以上至六百元交百分之一，六百元至八百元交百分之一點五，八百元以上至一千五百元交百分之二，超過一千五百元者交百分之三。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12/n244650.htm>。

的。按中共目前三百四十萬個基層組織算，每個組織按一個半專職黨務人員計，則有五百一十萬專職黨務人員。這五百一十萬專職黨務幹部，每月需領固定薪水，以平均每人每月五百元計，全國基層組織則每月需支付薪水二十五億五千元，每年則需三百〇六億元，而這個數位還是保守的，因為不包括諸如加班津貼、出差補助、醫療保健、住房福利等各種開支。即使這樣，按每年中共黨費收入數十億來說，遠遠不夠支付這些黨務幹部的薪水。」<sup>20</sup>

由此觀之，中共僅靠黨費收入的確無法應付龐大的黨務支出，在目前缺乏一套國家公開對政黨經費挹注的制度情形下，除非中共自有開源途徑（例如經營黨營事業或從事投資），否則不免令人產生其「國庫通黨庫」已達何種緊密程度的聯想。當然，以中共行之有年的黨國體制，黨政不分表現在人事與政策運作的情形比比皆是，若言政府與政黨之間的經費重疊相通，並不訝異。這種有違西方民主政治常態的作法，中共並未多做解釋，但以其獨據國家資源用於黨務經費的現象看來，絕對可以支持中國大陸政黨系統是由中共一黨掌控的評斷。

### 三、國家政體與能力圖像：

所謂政體（Regimes），係指涵蓋政府機器與國家制度，包括與更大的社會互動的結構與過程，它是一種「遊戲規則的體系」，即使負責政策運作的政府不斷更替，但是政體依舊運行不墜。<sup>21</sup>從政體的形成與結構，可以窺視在此體系中政黨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有助於瞭解黨與國家之間的連動關係。

根據海伍德（Andrew Heywood）研究認為，西方政治學最具代表性的政體分類學說，首推亞里斯多德早在第四世紀針對希臘城邦所進行的政體界定，從統治與被統治的主體，區分出暴君（Tyranny）、寡頭（Oligarchy）、暴民（Democracy）、君主（Monarchy）、貴族（Aristocracy）、民主（Polity）等六種政體。隨著世界體系與國家類型的演變，政治學界對於政體的研究也出現諸多領域，包括「三個世

---

<sup>20</sup> 凌辰，「誰人敢於質疑，中共財源從何而來」，**自由論壇（FREEFORUM-MAGAZINE）**（2000年1月），第53期，<http://ziyou.virtualave.net/liebiao/53.txt>。

<sup>21</sup>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年11月），頁42。



界」、「西方多元政體」、「後共產主義政體」、「東亞政體」、「回教政體」、「軍事政體」等。海氏將中共政權歸納為東亞政體的一環，強調在儒家文化的共同性下，由服從所衍生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強勢政府的思潮，充斥在東亞地區中，儘管中國與此區域其他國家有許多差異，但這並不影響中共成為東亞政體的一員。<sup>22</sup>

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以「斷裂的權威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形容目前的中共政權。李氏認為，自七〇年代末隨著改革政策提上議事日程後，因為結構上的功能分化連帶使得官僚體系之中缺少了單一權威，而預算權威的分權化也讓地方不完全仰賴中央財政，加上中共減少壓迫性手段，學術研究領域的更具彈性，以及官方在意識形態採取較諸以往略顯鬆散的控制等，都可以證明中共已走向斷裂型的權威主義政體。<sup>23</sup>

趙建民從另一角度切入，亦認為中共當屬於威權式政體。他指出，西方學者將中共視為極權（Totalitarianism）政體者不乏其人，例如華裔美籍學者張霞（Maria Hsia Chang）稱中共為理性極權主義（Rational Totalitarianism），亦有學者以毛澤東掌權時期作為分水嶺，將毛時期視作極權主義，後毛時期稱做後極權式的威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 Regime）。不過，趙持較為相異的觀點認為，從社會多元化苗頭初露、政策二元化、新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意識形態角色變化等面向觀察，中共已經開始強調官僚化、法制化、重用科技官僚、避談理論且多談實際，顯示其政治體制已出現鬆動現象，更多地表現出威權政治型態特徵。<sup>24</sup>

劉雅靈、張弘遠則以國家能力圖象來詮釋中共政體的本質。劉雅靈認為，中共中央政府雖具備極強的專制能力，但其基礎能力卻相當薄弱，使得政策、政令下傳至地方層級後無法貫徹持續，造成中央必須予以整肅糾正，這一種政策操作上的間歇循環，劉稱之為「間歇性極權國家」（Sporadic Totalitarian State）模式。<sup>25</sup> 對此，張弘遠提出解釋認為，由於中共的國家能力受到過去多次群眾運動的負

<sup>22</sup> 同前註，頁 42-65。

<sup>23</sup> Kenneth G. Lieberthal,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Kenneth G. Lieberthal & David M. Lampton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8-9,

<sup>24</sup>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3 年 12 月），頁 195-209。

<sup>25</sup> Yia-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面影響，慣以組織紀律、階級鬥爭等方式推動政策，導致施政過於依賴專制能力，一旦專制能力成本大於邊際效益，執行政策的困難將會提高，效果反致降低。<sup>26</sup>

大陸學者蕭功秦，係以發展政治學的概念，認為中共已走進「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權威政治模式」(Post-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o-authoritarian Regime)。這種發展模式有三個特點：一、技術官僚執政。二、低政治參與與高經濟投入相結合。三、是從改革以前的社會主義全能體制演變過來的，仍具有高度的全面性掌控色彩。<sup>27</sup>

無論是威權，亦或是極權，在西方政治學概念中，都是源出於「權力」這個要件表現在宰制與被宰制（或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程度，看待政黨在國家中所處之地位。雖然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大多重視草根文化主義，但其最終目標，還是強調奪取立法與行政權力，更嚴格地說，是全面性社會生活代表機制的權力，並進而針對國家層面的民主控制，採取有效的掌控。<sup>28</sup>由於中共的黨國體制成分極高，其所帶有的列寧主義式政黨（Leninist Party）的制度精神，突顯了中共黨的特性：具有自覺性（Self-Conscious）和目的性（Goal-Oriented）；以及對社會、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進行的全面性塑造。<sup>29</sup>誠如出身大陸的學者吳國光所言，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一種顯著特徵，是政府（準確地說是「政權」，因為政府在共產主義制度國家被共產黨嚴格控制著）對於社會生活的全面而嚴格的控制。<sup>30</sup>這種控制，很大部分來自於「無產階級專政」理念的唆使，再加上中共強調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唯一代言人，是建設中國為社會主義國度的唯一執政黨，因此當改革開放的氛圍逐漸擴散，而鄧小平與江澤民仍分別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際，中共做為一個從毛時期極權走向鄧江時期威權式政黨的特徵，就格外明顯了。<sup>31</sup>

---

of Wenzhou, ”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0,1992, pp.313-314。轉引自張弘遠，**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中政府角色與企業行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民國90年6月），頁16。

<sup>26</sup> 同前註，頁17。

<sup>27</sup> 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威權政治」，**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頁82-83。

<sup>28</sup>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The Thetford Press Ltd., 1983), p.76.

<sup>29</sup> 呂曉波，「關於革命後列寧主義政黨的幾個理論思考」，周雲光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1月），頁194-195。

<sup>30</sup> 吳國光，「自由：推進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基本導向」，陳一諮等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6月），頁128。

<sup>31</sup> Parris H. Chang, “Changing of the Guard”, *The China Journal*, No.45(2001), pp.37-43.

## 第二節 馬、恩、列、斯與中共領導人 對共產黨政黨屬性的定義

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啟發者、承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國內亦譯為史達林，為求引文統一起見，文內稱斯大林）以及中共歷任領導人，對於如何運用組織力量為手段，創建一個消滅資產階級剝削、維護無產階級權益的社會，視為頭等大事。尤其是列、毛等當代大型共產制度國家的創建人，均認為無論在革命階段抑或是執政時期，要將這種作為手段的組織力量發揮至極致，運用政黨形式為之，是無可取代的途徑。

綜合論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在列寧時代可謂集大成，列寧在其建黨理論當中，以思想和組織兩部分明白地指出了共產黨的基本特質。思想上強調：一、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二、必須不斷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將二者做緊密結合；三、必須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做堅決鬥爭。組織建設上則認為：一、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二、黨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部隊；三、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四、黨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五、黨必須密切聯繫群眾；六、黨要保持自己組織的嚴整和紀律。歸納起來，共產黨的基本屬性，應該具有以下特點：

### 一、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

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點，資產階級是必定會被推翻的，不過無產階級欲推翻資產擁有者所主宰的國家機器，必需組成政治組織，以這個政治組織作為與資產階級鬥爭的主要工具。恩格斯指出：「要使無產階級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必須（馬克思和我從 1847 年以來就是持這種立場）組成一個不同於其他所有政黨並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sup>32</sup>

重點在於，這樣的一個政黨組織，其基本性質必須是以「無產者」為主體，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這些無產者主要是工人族群，恩格斯即強調，「各地的經驗

<sup>32</sup> 恩格斯，「致格·特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頁469。

都證明，要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這種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一個國家裡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sup>33</sup>馬克思亦認為：

「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權力的鬥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工人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sup>34</sup>

隨後，作為真正實現共產主義政黨治國理想的第一人——列寧，繼承了上述觀點道：「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sup>35</sup>「我們一定要保持、鞏固和發展我們的完全獨立的、堅持原則的、覺悟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黨，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sup>36</sup>

斯大林更將無產階級的重要性，提高到頂峰地位，並對階級與黨的從屬關係做出「在政治方面不是階級依靠黨，而是黨依靠階級。」<sup>37</sup>的註腳。

毛澤東延續前人的論點認為，「黨是階級的組織，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主要是由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出身的人組成的。」<sup>38</sup>「我們的黨之所以獲得偉大的成就，就在於我們的黨從最初建立時起，就是一個完全新式的無產階級政黨。」<sup>39</sup>

其他中共黨人如劉少奇補充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除開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外，共產黨沒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人類解放的利益，共產主義的利益，社會發展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sup>40</sup>周恩來採相同立場表示「要使黨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加強，首先要擴大黨的無產階級的組

<sup>33</sup> 恩格斯，「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頁321。

<sup>34</sup>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同前註，頁138。

<sup>35</sup>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頁510。

<sup>36</sup> 列寧，「我們的任務和工人代表蘇維埃」，**列寧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

<sup>37</sup> 斯大林，「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頁162。

<sup>38</sup>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335。

<sup>39</sup>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頁315。

<sup>40</sup>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同前註書，頁130。

織基礎。」<sup>41</sup>江澤民則明言「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sup>42</sup>

至於共產黨（或社會民主工黨）這個以無產階級、勞動工人為主體的政黨，要如何處理與其他無產者之間的關係？馬、恩在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做出了以下的解釋：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部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sup>43</sup>

在此我們甚至可以發現，「宣言」中強調「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似乎已經為江澤民時代「三個代表」的說法，做出了預視性的鋪路工作。

綜合觀之，馬、恩等人堅信，在階級社會中，消滅剝削是符合被剝削階級利益的，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適合承擔這一消滅剝削、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無產階級當之無愧。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組織成為政黨，以戰勝資產剝削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促進社會主義的變革。<sup>44</sup>不過，馬克思關注的焦點，還是在社會階級的議題上，這與列寧強調政黨必須作為關鍵地位的觀點，有很大的出入。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認為，馬克思並未認識到政治活動的自主性，對於超越社會階級秩序的政治秩序也沒有深厚概念，因此他並未針對無產階級組成政黨，同時創建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架構，提出完善的政治理論。反之，列寧則將黨作為政治體制的重心，並把其提高到社會階

<sup>41</sup> 周恩來，「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頁12。

<sup>42</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論三個代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頁167。

<sup>43</sup>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同註32，頁264。

<sup>44</sup> 蘇紹智，**馬克思主義新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81年6月），頁120。

級與社會勢力之上，成為橫跨全國家領域的唯一樞紐。<sup>45</sup>

## 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先鋒隊：

馬克思在處理階級與黨的相關問題時，並未直接涉及黨的組織、形式部分，惟事實上這涉及了無產階級是否需要先鋒隊（Vanguard）的核心議題。無產階級、黨、先鋒隊，這三種原始意義不相同卻為列寧等人融合且巧妙運用的概念實體，其融合成形所需時間並不長。依據米立班（Ralph Miliband）的看法，當從無產階級需要先鋒隊，到正式成立先鋒隊黨的實踐，勢必會造就出只能有一個勞動階級黨的認知，這種情形在俄國共產革命運動過程中整個表現了出來，<sup>46</sup>而隨後的中國亦如法炮製，只是在實際行動中，毛認為應更依賴農民，<sup>47</sup>對此，杭亭頓指出，毛參與了1926-1927年的國民黨北伐之役，發現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因為這種自發性農民暴動，是發生在土地分配極端不均、生活環境極端惡劣的地區，其所產生的結果是孫中山致力四十年革命所未能達到者，因此，這使毛等共產黨人對於農民作為革命力量所起的關鍵作用，有了新的認識，<sup>48</sup>後形成以工人階級為主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政黨。

列寧以先鋒隊的概念，賦予了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無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他指出：「黨是階級的先鋒隊；它的任務決不是反映群眾的一般情緒，而是引導群眾前進。」<sup>49</sup>「黨是階級的覺悟的、先進的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sup>50</sup>這種以職業革命家為主體、民主集中制為號令的政黨觀，雖然受到托洛斯基抨擊為替代主義（Substitutism），以及羅莎盧森堡批評有集中主義（Centralism）的影

<sup>45</sup> Samm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張岱云、聶振雄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11月初版二刷），頁338-339。

<sup>46</sup> Ralph Miliband, *Ma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Press, 1977), p.128. 轉引自趙相明譯，**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5月），頁168。

<sup>47</sup> 例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即指出：「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間，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頁21。

<sup>48</sup> 同註45，頁303。

<sup>49</sup> 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講話」，**列寧全集，第二 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00。

<sup>50</sup> 列寧，「維·查蘇利奇在怎樣傷害取消主義」，**列寧全集，第 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07。

子，但列寧卻不為所動，強調無產階級、工人階級需要被領導與影響的不可抹滅性，才能成為訓練有素的戰鬥體。<sup>51</sup>

就中共而言，延續列寧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概念，是為自己鍛造革命主體合法性的重要步驟。劉少奇即指出，「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sup>52</sup>朱德認為「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為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的。」<sup>53</sup>鄧小平亦表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問題，是要恢復黨的戰鬥力。黨應該是一個戰鬥的隊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應該是統一的、有高度覺悟的、有紀律的隊伍。」<sup>54</sup>

而強調先鋒隊最不遺餘力者，當屬江澤民，江多次強調：「我們一定要緊緊聯繫黨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任務，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始終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sup>55</sup>「我們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工人階級先鋒隊。」<sup>56</sup>「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民族人民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地位是由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決定的，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形成的。」<sup>57</sup>「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sup>58</sup>「保證我們黨始終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sup>59</sup>在這裡可以清楚發現，自江澤民「五三一講話」後，中共就已經把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性，增加「中華民族先鋒隊」的闡述，希望以「兩個先鋒隊」的概念，將傳統狹隘的工人階級代言政黨的色彩，藉由歷史與民族主義論述，予以延伸。主要目的，還是要強化其執政地位

<sup>51</sup> 李英明，**馬克思社會衝突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79年8月），頁96-97。

<sup>52</sup>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頁322。

<sup>53</sup> 朱德，「在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48-249。

<sup>54</sup>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頁232。

<sup>55</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652。

<sup>56</sup>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頁39。

<sup>57</sup>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45。

<sup>58</sup> 同註42。

<sup>59</sup> 此為江澤民於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講話內容，見**人民網**，<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6/20020531/742159.html>。另江澤民於「十六大」報告中，亦提出相同論述，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無可取代的單一、合法性。

從黨的建設、意識形態、領導地位、代表屬性等各方面觀察，中共歷代領導人與江澤民始終沒有放棄共產黨做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傳統論述。即使在國共內戰時期工人只是階級鬥爭運動中的一環；即使九〇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出現了幅度不小的轉變，「三個代表」的出台，暗示著中共對於新的社會階層似乎開了一道接納的門；即使因為國有企業改革，使得許多工人下崗失業而造成大陸社會相對穩定狀態下的潛藏動亂因素。但是江秉持前人意志，續保中共黨徽上「錘頭」象徵地位的信念，依舊沒有改變。

### 三、共產黨是革命與執政的主體：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的看法大致相近，即資本的廢除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革命，革命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轉化，而非用以獲取社會轉化的方法。他們認為武裝衝突由資本主義政府引發的可能要比工人組織為高，馬克思言「無產階級並不容許自身被挑起來反叛，因為它正處於創造革命的邊緣」，<sup>60</sup>質言之，馬克思期望無產階級革命要比歷史上產生資本主義革命的暴力程度來的少，因為「無產階級是被事態的邏輯逼上革命之路的」。<sup>61</sup>不過，馬、恩等人所預設的工人階級革命，最後卻淪於權力集中在「先鋒」、「菁英」上，缺少了自由與民主的展望，使得勞動者並未放棄以暴力形式實現革命意志的理念。<sup>62</sup>

如欲探究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與革命之間的關係，米立班的研究結論當屬精闢。米立班認為，馬克思強調勞動者、無產階級是透過自己形成政治組織，這樣的政黨既非宗教，也不是職業密謀家（Professional Conspiracy）的集合體。馬克思並不關心政黨的形式，更注重藉此機制，使無產階級不斷發展出階級意識以達成自我解放的鬥爭。因此，政黨只不過是勞動者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表現與工具，同時藉由這種工具的協助下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張。<sup>63</sup>

<sup>60</sup> 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同註 32，頁 130。

<sup>61</sup>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同註 32，頁 250-251。

<sup>62</sup> Thomas Sowell, *Marxism: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蔡伸章譯，**馬克思學說導論——哲學與經濟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37-242。

<sup>63</sup> 同註 44，頁 159。



這樣的看法，在列寧卻不以為然。例如他在「國家與革命」書中表示：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sup>64</sup>

誠然，列寧賦予了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更高的地位，而強調「槍桿子出政權」，以「農村包圍城市」完成革命建國的毛澤東，更是抱持類似的信念。毛曰：「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裡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sup>65</sup>「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sup>66</sup>

毛的這種說法，將中國命運與共產黨的革命結合在一起，從結果（共產黨建立新中國）而言，可以接受。不過，這種以共產黨的主流一元式價值論述中國的革命，則有待商榷。例如日本學者天兒慧即指出，從共產黨或國民黨中擇一視為革命主力的作法並不恰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同時發揮中心力量的，還有民主人士諸黨派，由勞工、農民、市民自發形成的群眾運動，以及傳統的秘密結社運動等等，所以新中國的革命應該是由複數中心，多樣型態推進的革命。而且若與俄國等其他革命國家相比，新中國革命歷經半世紀，且仍有許多未完成的目標，嚴格來說，應該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sup>67</sup>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亦認為，當中共所領導的革命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革命時，那麼它就不必然屬於社會主義的一環，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即使中共領導人提出許多願景，但是實際的政策效果卻與社會主義相去甚遠。<sup>68</sup>在這種情形下，這個未完成的革命，

<sup>64</sup> 列寧，**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頁29。

<sup>65</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組主編，**毛澤東、鄧小平論中國國情**（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10月），頁135。

<sup>66</sup> 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357。

<sup>67</sup> 天兒慧，**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劉靜貞譯，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授權（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7月），頁58。

<sup>68</sup> 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Press, 1996), p.26

在毛澤東的心中，必須以「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來加以完善。羅德明（Lowell Dittmer）的研究解釋說，在中國歷史上，獲取政權之後繼續革命者所在多有，但是毛所強調革命的特殊之處，重點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用以宰制建立政權後的政治格局。<sup>69</sup>不過，當中共在文革之後，面臨如何處理內部矛盾問題時，鄧小平對於繼續革命的說法，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麼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sup>70</sup>

當然，毛師法列寧提出的「不斷革命論」，也是為了新的共產主義國度跳過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但卻無法完全消弭資本主義成分，因此勢必要在意識型態領域中，樹立一套自圓其說，並排除敵對階級復辟謀權可能性的論證意涵。更重要者，如何在建立政權之後，圍繞「鞏固執政地位」這個中心任務，給予更強而有力的立論基礎，才是中共黨人汲汲營營、不曾間斷的努力目標。事實上，布爾什維克黨革命成功之後，列寧就已經為黨的執政地位定下不可動搖的基礎，他說，「我們的黨又是執政黨，因而自然也就是公開的黨，是加入之後就能掌權的黨。」<sup>71</sup>而中共則以多面向敘述，為其執政地位鋪路：

（一）從民粹主義（Populism）出發，毛澤東強調「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sup>72</sup>毛甚至把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劃上等號，稱「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sup>73</sup>鄧小平則用趨近的說法強調「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夠改變的。」<sup>74</sup>江澤民亦言「因為我們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黨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sup>75</sup>中

<sup>69</sup>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2.

<sup>70</sup>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註 54，頁 169。

<sup>71</sup> 列寧，「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 443。

<sup>72</sup> 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 809。

<sup>73</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同前註，頁 1087。

<sup>74</sup>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同註 54，頁 232。

<sup>75</sup> 江澤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做到『三個代表』」，同註 42，頁 3。

央反覆強調領導幹部要保持頭腦清醒，其中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時刻擺正自己同人民群眾的關係，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時刻警惕脫離群眾的影響」。<sup>76</sup>

(二) 從功能主義與結構主義角度出發者，如鄧小平即言：「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指出這一點，在今天黨已經在國家工作中居於領導地位的時候，特別重要。」<sup>77</sup>鄧尚以自問的方式表示「執政黨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做善於領導？」<sup>78</sup>指出中共對於執政功能的主要問題所在。毛澤東更以「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sup>79</sup>這樣的說法，將共產黨的執政管轄範圍，做出清楚的界定。

(三) 從革命向執政轉化的角度出發，如鄧小平強調「自從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成為全國團結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結束了。」<sup>80</sup>江澤民表示「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sup>81</sup>胡錦濤則言「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們黨對執政條件下如何加強黨的建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艱苦探索，累積了豐富經驗，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辦法，但是也發生過一些失誤甚至嚴重挫折。」<sup>82</sup>

總體來說，西方式政黨是以民主為導向的，政黨與民主政治相互作用，但政黨也具有反民主的成分，因為多數政黨權力總是趨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非理論上的「選民」，寡頭傾向所在多有。杜瓦傑即認為，威脅民主制度的不是政黨制度，而是政黨內部結構的發展方向，危險不是政黨本身，而是政黨可能出現的軍事、宗教和專制性質<sup>83</sup>。從這個角度言，中共自我所強調的政黨屬性，包括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先鋒隊，執政黨等概念，固然有著歷史沿革因素，也把現實

<sup>76</sup>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註 57，頁 154。

<sup>77</sup>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 225。

<sup>78</sup> 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同前註，頁 240。

<sup>79</sup> 毛澤東，「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832。

<sup>80</sup>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同註 54，頁 231。

<sup>81</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同註 57，頁 164。

<sup>82</sup> 胡錦濤，「總結和運用『三講』教育經驗，努力開創黨建工作新局面」，**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頁 1506。

<sup>83</sup> Maurice Duverger, *Party Politics and Pressure Groups*(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Inc.),p.374.

政治考量其中，但這些論述的中心意旨，不能擺脫從最低程度的生活控制到最高程度的政治控制。或許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統治手段，惟共產黨人在理論建構與宣傳中擺進再多的「人民」、「先鋒」、「代表」等詞彙，最終還是放置在「領導」、「菁英」、「統治」的位階之下。